

关于“学而时习之”章的解释 及其所反映的孔子精神

李启谦

一、问题的提出

《论语》是反映孔子思想的主要典籍，《学而》是《论语》的第一篇，“学而时习之”章又是第一篇的第一章，其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性自然可知。因此，研究孔子和《论语》时，首先把这一章的言词语句和精神实质搞清楚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可惜的是，自古至今，很多人对这一章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该章共有三句话，即：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目前人们根据历代多数学者的注释译成的白话一般是：

孔子说：“学了后再时常（或按时）温习，不是也很高兴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是也很快乐吗？别人不了解自己，自己不恼怒，不也是个君子吗？”

我认为以上译成的白话很不恰当，因为如果这样理解这一章的

内容，从很多方面都是讲不通的。

第一，前后连贯的体例问题。一部《论语》共 20 篇，498 章，每一章都是前后连贯地说明一个事、理。不仅六七个字一章的是如此，就是最长的有 315 个字的《先进》篇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也是系统地记述同一件事。然而唯独第一篇第一章，三句话三个意思，前后互不连贯，前面说的是学了后再时常温习的问题，中间说的是来了朋友的问题，后面说的是别人不了解自己也不生气的问题，前、中、后三者的内容根本不接茬，这不符合《论语》的各章前后连贯的体例。

第二，开宗明义的要旨问题。绝大部分典籍或著作，往往在前言或第一章中，都要说明该书的主旨、要义或基本态度。儒家典籍如《大学》、《中庸》、《孟子》等等莫不如此，然而唯独《论语》第一篇的开头，不仅三句话三个意思，而且只是讲些生活问题，从中根本看不出它的主旨所在，也看不出孔子对其学说的基本态度。这是不符合开宗明义的惯例的。

第三 孔子对学习的态度问题。孔子是“敏而好学”、“学而不厌”的，但他从来不提倡死记硬背，而是鼓励人们在学习中去取得新体会和新收获。他称赞子贡学《诗》有新体会，“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又评论颜回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为政》)显然，“回也不愚”是因为颜回有新发挥、新发明。孔子曾强调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既要“温故”，又能“知新”，这才是“为师”的条件。与此同时，孔子对那些死念书本的人，是不欣赏的，他曾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

所以，孔子对单纯地“温习”从来是不赞成和不欣赏的。

另外，孔子还格外重视“行”，他一再说要“敏于事，慎于言”（《学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对那些只会温习背诵而不能实际办事的人，不但不喜欢，反而认为是无用之才。如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由此可以看出，他对那些只能背诵书本文字，而不能用于社会实际的人，是很不以为然的。

因此，要是说孔子学了后再温习一下就格外高兴，恐怕有失孔子的原意。因为学了以后再进行温习，这是常事，不一定有多么高兴。聪明人一学就懂，再叫他去按时温习，他就乏味。较笨的人去温习，很费力，也不会高兴。不用功的人，强迫他去温习，自然更无兴趣。总之，学了以后再温习一下是应当的，但如果没有新体会、新见解和新发现，只是温习再温习，当不会有多大的高兴可言。

由上情况可以看见，不论从哪个角度讲，目前通行的对“学而时习之”章的解释，都是不能成立的。

二、“学而时习之”章另解

怎样解释“学而时习之”章才合适呢？《齐鲁学刊》1986年第6期发表《“学而时习之”章新解》一文，曾提出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新看法，但因该文短小，论述不充分，所以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下面参考该文的一些提法，结合自己的理解和心得，提出一些认识，以供大家讨论。

我认为，这里的“学”不是动词，而是名词，指的是孔子

的“学说”。“时”不应解作“时常”或“按时”，而应解作“时代”（可引申为社会）。“习”不应作“温习”讲，而应作演习、采用讲。这样一来，全章的意思大体是：

孔子说：“如果我的学说被时（或社会）所采用，那不就太值得高兴了吗？退一步说，如果时代没采用，可是有很多赞同我的学说的人从远方而来，和我一同讨论问题，不也很快乐吗？再退一步说，不但社会没采用，而且人们也不理解我的学说，我也不恼怒，不也是位有道德修养的君子吗？”

这样理解是否科学和恰当呢？是否有根据呢？请看下面的分析：

1. 符合前后连贯的体例。该章实际上说的是，孔子对其学说三种不同境遇的三种不同态度。第一种最高兴；第二种也快乐；第三种不悲观不失望。这样看就和《论语》各章前后连贯的体例相一致了。

2. 符合首篇首章开宗明义的惯例。按照这一新解释，《论语》一开头就讲孔子对其学说的基本态度。首先要争取实现自己的理想；若退而求其次，则要得到很多人的理解和支持；最后，若不被人知，也要抱定信念，不失君子的品格。这就和其他著作一样，也是一开头就宣明自己的观点和基本态度的。

3. 符合孔子的实际情况。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入世的人。他努力宣传自己的学说，而且很多弟子也给以称赞，他从中确曾得到快乐。可是他的学说没被各国接受，在鲁国受到排挤，在周游列国期间更有过匡被围之难，有“微服过宋”之险，有陈蔡绝粮之苦等等。可是，在任何艰苦情况下，孔子都没有悲观失望，而是坚持宣传自己的学说。这样看“学而时习之”章的三句话，也就是对其经历和对其不同境遇

所抱态度的真实写照。另外，这样理解也符合孔子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和“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季氏》）的一贯态度。

4. 文字训诂通顺。尽管前面说的合乎情理，但是如果文字训诂不通，这一新解释也不能成立。可是恰恰在训诂方面，能够完全讲得通。请看事实。

“学”字固然可以训为学习，但也可以解释为学问、学说、学派。《庄子·天下》：“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这里的“学”便是学说的意思。不仅道家的典籍中有这样的义项，儒家的文献中也有，如《大学》首章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里的“学”，也是学说之义。再进一步说，就是《论语》中也同样有之，如“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述而》）这里的“学”字，也是学问、学说之义。其实古人已看到了这一点，如毛奇龄在《四书改错》中就说：“学者，道术之总名。”程树德在《论语集释·学而上》按语中 also 说“学字系名辞”。如当名词讲，就是“学说”的意思。

“而”字，从来是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讲法，其中有的训为“若”，如王引之训《诗·小雅·都人士》中的“垂带而厉”的“而”字时，就训为“若”。还有的训为“能”，如《庄子·逍遥游》“而徵一国”，郭庆藩就训“而”为“能”。

“时”字，固然可以作时常或按时讲，但是在先秦两汉的古籍中，作“时代”“时世”讲者也多有之。如《墨子·兼爱下》说：“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这里的“时”就是时代的意思；“同时”就是同时代。《孟子·公孙丑下》：“彼一时，此一时也。”这里的“时”与上同义。《楚辞·离骚》：“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这里的“时”也是时

之义；“时俗”就是时代的风俗。时，时代也，可引申为社会。

“习”字，在大量古籍中多作“演习”“实习”之义，如《左传·隐公五年》“习威仪也”，再如《礼记·射义》“以习礼乐”、“习射于泽”等等就是。《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这“习”字，更是实际“演习”的意思。这些“习”字，都是和做、行、用相连系。另外，有的还作“因袭”解，如《左传·襄公十三年》：“岁习其祥，祥习则行。”总之，“习”有实际演习、因袭和相因而行的意思。

“说”（或悦）、“乐”两字的训释，自古及今没有大的争议。但似有程度不同的差别，晋代谯周注解：“悦深而乐浅”（玉函山房辑佚书《论语谯氏注》）。宋代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说在心，乐主发散在外。”这是说，两字虽都有喜乐之义，但在喜乐的程度上以“说”为最，以“乐”次之。

通过以上训诂可以看出，“学而时习之”章的新解是可以成立的。

5. 《论语》末篇末章的启示。孔子晚年已感到“吾道不行矣”（《史记·孔子世家》）他对自己学说没得到社会采用表示出的态度是：“不怨天、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同上）。孔子晚年这个态度和“人不知而不愠”的态度是一致的。问题分析到这里，我们又发现，《论语》最后一篇最后一章是：“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意思是说，我的学说没被采用是天命如此，不懂得这一点而有所怨恨，就不算是位知命的君子。这和《论语》首篇首章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精神也是一致的。我认为这种前后相互照应的编排，绝不是偶然的，应是孔子对其学说所抱态度首尾一贯的反映，也是《论语》编纂者有意的安排。这一点更说明“学而时习之”章新解是恰当的。

总之，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以上对“学而时习之”章的新解，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三、几点认识和评说

新的解释既明之后，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弄清楚。

1. 时间问题。孔子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前、后期是不一样的。判明孔子说这段话的时间，有利于了解这里所说的“学”的内容。

从“有朋自远方来”这句话看，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五年……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鲁定公五年是公元前 505 年，这年以后孔子的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而“有朋自远方来”就是说的这类事。这年孔子 47 岁。由此可以推断，这段话肯定是在孔子 47 岁以后说的。至于后到哪一年，再从他有“人不知而不愠”的经历看，孔子所遇到的最大的“人不知”，首先是在鲁国受到排挤，并于定公十三年被迫出走之事，这年孔子 55 岁。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粗略的认识，即“学而时习之”章是孔子 55 岁前后时说的。

2. “学”指什么学说的问题。在孔子思想中，既有“礼”的学说，也有“仁”的学说，那么“学而时习之”的“学”是指哪种学说呢？这需要弄清楚。

孔子思想发展演变过程是，早年重视礼，后来重视仁。“大量资料表明……孔子是在五十岁以后，也就是他被迫辞职离开鲁国前后提出‘仁’来的。”（见拙著《结合鲁国社会特点认识孔子思想》载《齐鲁学刊》1987 年 6 期）其后他就用仁

的思想来改造和统帅原先的礼的思想。他是先成为礼乐大师，50岁以后成为仁的思想家的。既然知道他是50岁以后提出和宣扬“仁”的，同时又知道，他是在55岁左右说“学而时习之”那段话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学而时习之”中的“学”，就是他的“仁”的学说。他是为实现“仁”的学说而奋斗而高兴的。

还必须明白，孔子“仁”的思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个不断充实完善的过程。开始时，“仁”的内容主要是“爱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后来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他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各个层面、各类文化，使之认识到，蛮夷人也知礼义，下层社会也有智慧等。这样，在他“仁”的学说中，就又增加了南人可亲，下层社会也有智慧的观念。在周游列国的后期，在他的脑海中，又出现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和次一等的“小康”境界。这就在他的仁学中又充实了一种“与民同乐”的“大同”的美好社会憧憬。

3. 如何看待该章所反映的孔子精神的问题。自己的思想学说得到社会采用，当然最高兴；不被采用，有人赞同也值得欣慰；倘若不幸而未为人知，也不悲观颓废，而要坚持做一个有信念有品格的君子。这就是该章所反映的孔子精神。

孔子和《论语》的编纂者，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一精神呢？经初步考查后认为，这一精神对孔子及其弟子，确实曾起到稳定情绪、保持信心、鼓舞士气和增强本团体凝聚力的作用。这仅从周游列国期间所遇到的一些情况，就可说明这一问题。如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时，孔子就“讲诵弦歌不衰”（《史记·孔子世家》），以此稳定弟子的情绪。当一些弟子“有

愠心”时，孔子就叫得意门生颜回发表意见，借以教育其他弟子。颜回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同上）这里的“不容然后见君子”的“君子”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君子”，其精神状态是完全一致的。而孔子正是利用这一精神来感染和教育其弟子的，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孔子“仁”的学说，始终没被各国国君采用，直到晚年回到鲁国时仍一如既往。在此情况下，孔子还是抱着“不怨天，不尤人”的态度，也就是“人不知而不愠”的态度，来对待此事。可见“学而时习之”章，就是孔子终生的格言。

不仅孔子如此，就是后儒也有这种精神，如子思说：“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中庸》）后来孟子更说：“人知之，亦嚣嚣（自得其乐之貌）；人不知，亦嚣嚣。”又说：“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显然，这一精神既包含有思想家经世济民的崇高愿望，也有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的洒脱，以及于失意之际修身见世、待时而动的奋斗意向，不仅古人可以从中受到影响和熏陶，而且今人也可以从中吸取有用的东西。当然其中也有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一面，对此应予注意，但总的来看，积极面大于消极面。至于如何批判继承，那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在此不便展开讨论。

4. 如何对待两种不同解释的问题。如上所述，“学而时习之”章，自然应当按照新的解释去理解。但是，旧的注解，已经广泛流传，尤其是朱熹的《四书集注》也是如此解说，并且

后来成了官方认可的标准注本，凡是读书人都十分熟悉朱熹的注解，这样旧注很快就成了社会的共识。在此情况下，“学而时习之”就又逐渐成了表达学习后再时常温习的一句习惯用语。另外，学习后时常温习一下，能巩固和加深学习成果，是符合学习程序的。因此，谁要是一见到“学而时习之”五个字，就想按照新的解释去理解，这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何看待这两种解释呢？我想应当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当学者们把“学而时习之”放在《论语》第一篇第一章的位置上来理解的时候，一定要遵从新的解释；要是把这句话当成一般社会用语时，就不妨按照传统的解释去对待。我想这是比较恰当的。

同一语句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解释，也还有别的例子。如“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人们一看就会知道，这是说“四体不劳作，五谷不辨识”。但是，这句话在《论语·微子》篇中的“子路从而后”章，就不能如此解释，因为这句话中的两个“不”字都是虚词，无意义。相反，这句话是指“四体勤作，分辨五谷”。只有这样讲解才符合原文原义。（详见拙文《试析论语 子路从而后章》载《东岳论丛》1995年第5期）因此，“学而时习之”章，也应在不同情况下，作出不同的解释。

《论语》首章与《孔子家语·屈节》篇

——孔子政治命运悲剧的两个诠释

杨朝明

孔子一生积极入世，十分关注社会现实政治问题，但“夫子之道至大”^①，天下莫能容夫子^①。在诸侯竞霸、“争于气力”^②的时代，各国当政者专注于军事斗争与争霸图存，孔子的思想主张就难以得到为政者的赏识。孔子常常处于苦闷之中，对自己的政治境遇感到无奈。他曾说“予欲无言”^③，他的思想学说与现实政治不相“兼容”决定了孔子政治命运的悲剧结局。

如何理解和认识孔子的政治命运？笔者认为，在这方面，《论语》首章与《孔子家语·屈节》篇有重要的价值。孔子自称“述而不作”，我们今天研究孔子只有依赖其弟子后学对他言语行事的一些记录。在孔子研究资料中，《论语》的成书问题虽然也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作为“孔子应答弟子时人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④，它毕竟还被普遍认为是真实可信的资料。《孔子家语》长期以来被认为出于王肃伪造，但地下出土文献的研究已经证明这种看法的错误，《家语》重要的史料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真分析《论语》与《家语》的相关记载，综合分析材料，不仅可以增加对孔子政治命

运的深刻认识，两书材料的价值也可以得到更准确的理解。

（一）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 479 年），孔子溘然长逝。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时，他会如何认识和评价自己的一生？对此，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叙述孔子逝世时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描述：

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对于当时“无道”的天下，孔子有一整套的平治主张。但是，孔子系统的政治学说却没有得到施展，他一生凄凄惶惶，到处奔波，“干七十余君无所遇”^⑤，孔子思考自己的人生，将自己比作崩坏的泰山、摧折的梁柱、凋谢的哲人，他难免慨叹世人“莫能宗予”，对于自己的这种命运，不禁潸然泪下。

孔子晚年在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时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孔子少而好学，很早便以知礼明礼闻名诸侯。《论语·八佾》说：“子入太庙，每事问。”《史记·孔子世家》说：“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以至于连鲁国大夫孟僖子临死前还嘱其二子从孔子学习。孟僖子说：“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与？”孔子有很强烈的求知欲望，勤于学习，善于请教，因而见多识广，受到普遍的敬重。

孔子有卓越的治世才能。据《孔子世家》记载说，孔子曾经

担任中都宰 政绩卓著；孔子为中都宰，一年 四方皆则之。”还为季孙氏做过主管仓库的委吏 又做过管理牛羊的乘田“，尝为季氏史 料量平 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后来孔子为政于鲁 由中都宰为司空 由司空为大司寇。孔子年五十六 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余涂；涂不拾遗 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 皆予之以归。”

孔子的才能闻名遐迩，齐国与鲁国为邻，甚至担心孔子治鲁使鲁国强大 会给齐国带来威胁。齐人认为“鲁用孔丘 其势危齐”；孔子为政必霸”。对于孔子的才能 齐国人有真切的感触，齐、鲁两国国君在夹谷会盟时，孔子深谋远虑，力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 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根据两君会盟之礼 挫败了齐人的阴谋，赢得了会盟的胜利。其实，不仅齐国，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如孔子周游列国途中“在陈蔡之间 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 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 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楚 大国也 来聘孔子。孔子用余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

孔子名声远播，各国诸侯十分敬重孔子，有的甚至打算重用孔子。如齐景公“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卫灵公给孔子“粟六万”；楚昭王曾欲“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人们遇有重大问题往往向他请教，如卫国“孔文子之将攻太叔也，访于仲尼^⑥；鲁国的“季孙欲以田赋，使由访于仲尼”^⑦。

可是，现实的政治却使得孔子终不被用，在春秋时期的乱世中，天子衰微，政局动荡，用司马迁的话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⑧。在孔子看来，这是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乱世，所以他始终也没有找到适合推行自己主张的国度，因此，《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余陈、

蔡之间，余是反鲁”，最终仍然落得“无所遇”的结局。

对于孔子的政治遭遇，《史记·孔子世家》有一段十分传神的记述，生动地刻画了孔子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奔波的具体情形：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未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史记集解》引王肃曰：“丧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见饮食，故累累而不得意。孔子生于乱世，道不得行，故累累不得志之貌也。《韩诗外传》曰：‘丧家之狗，既斂而桴，有席而祭，顾望无人也。’”

《史记》这里记述的是孔子周游列国途中的遭遇。对此，有学者议论认为，太史公在这里用“丧家之狗”来比喻孔子，神似之极，确实言中了孔子命运的本质。在周天子的统治走向瓦解之时，诸侯各国大小吞并，弱肉强食，“更容易成功的自然是野心勃勃的狼，而不是忠心耿耿的狗”。孔子积极参与政治，“他既没有取而代之的狼的野心，又摒弃了遗世独立的鹤的清高，他愿意成为一条狗，为合乎自己理想的主人效劳，去挽救世道人心。然而，他是想要家而‘丧’了家的。……孔子始终找不到能实现理想的国家，终于成为‘丧家之狗’了”^⑨。

（二）

《论语》是研究孔子的基本材料，但是，由于人们对于该书成书问题的不同看法，对不少相关问题的理解也存有分歧。

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两点：首先，该书是一次编辑而成，还是陆续写成；第二，该书材料编排有无一定的顺序，是随意的堆砌，还是有一定的内在根据。

这两个问题其实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像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论语》是“孔子的学生们在 240 年的时间内逐步加上的”，则难以有什么次序。我们结合新近出土的材料进行研究，证明《论语》有一定的思想主旨，有内在的严密逻辑，有“正实而切事”的突出特征。该书材料来自孔门众多弟子，而由子思具体纂辑完成。^⑩

我们在研究中还特别提到对于《论语》首篇首章（即“学而时习之”章）的解释。按照传统的理解，本章分别讲学习、交友、人不知的问题。笔者认为这样的看法不如新的理解更近于实际，即首章中的三节应该概括了学者的思想主张与社会实际关系可能遇到的三种不同情况，勉励学者端正态度，树立坚持真理的君子精神。^⑪ 全章的意思大体是：

孔子说：“如果我的学说被时代（或社会）所采用，那不就太值得高兴了吗？（退一步说，如果时代没采用）可是有很多赞同我的学说的人从远方而来，和我一同讨论问题，不也很快乐吗？（再退一步说，不但社会没采用，而且人们也不理解我的学说）我也不恼怒，不也是一位具有道德修养的君子吗？”

我们这样理解《论语》首章，与孔子一生的出处进退完全符合。孔子的弟子门人当然了解孔子的苦闷，孔子与弟子门人常常谈论世道人生，也一定较多地谈论能否用世的态度。孔子的孙子子思更为了解孔子，他编排《论语》材料，综合孔子的人生态度与政治命运，自然会将能够贯穿和概括孔子政治生命的重要言论放在突出位置。

孔子当然不是空有热情，不是空怀理想而没有实际治世本领。他一心求仕，热心救世，但他的满腔热情换来的却是丧家失国。天下谁人能识君，天下几人能够了解孔子的抱负。孔子自然感触最深，痛之最切，言谈之中他会流露出类似情绪。孔子的弟子门人从孔子那里常常听到孔子的相关言论，因此，作为“正实而切事”的《论语》，其中便记述了孔子的不少相关论述。如《论语》末篇末章云：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论语》首篇末章同样谈“知”的问题，云：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除了这样的前后呼应，《论语》文中相关或者类似的表述还有不少。如《里仁》篇曰：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宪问》篇曰：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作为孔子言语的摘录，《论语》之中居然留下这么多相关言论，也能够隐隐透露出孔子政治上的郁闷。孔子不得不面对这种不被理解、不被认识的令人痛心的现实。

其实，《论语》中相关的记载还有不少，这些记载都意味深长，都可以与《论语》的首篇首章相互印证。如《宪问》篇记载说：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如知子也？”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当然希望自己的学说被世人行用，被社会认可，即使不是

这样，能够有人理解他，同意他的主张也是令人高兴的事情。但是，孔子周游列国终不被用，他不能不感叹自己的思想主张不能实现，感叹自己的仁政理想难以推行。但是，孔子能够做到“不怨天，不尤人”，因为他心目中的“君子”是“人不知而不愠”。这简直就是对《论语》首章的注脚了。

孔子毕竟坚信自己追求的“道”，坚定自己的政治信念，在没有人能够了解自己的情况下，孔子认为乃是世道使然，所以他发出了“知我者其天乎”的感慨。孔子还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⑫ 面对严酷的现实，孔子感到无力回天，无可奈何，认为这是由“命”注定了的，无论什么人，都一样地“其如命何”。孔子谈论天命，形成了他的天道思想。不难看出，孔子的天命思想正是他思考历史与现实，总结社会与人生而形成的。

孔子也不是一味地消极面对现实，他虽然意识到自己无力回天，但他的信念仍然支撑着他，他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⑬。《阳货》篇记载说：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欲无言”，是因为他已经清楚自己的主张难以被人理解，被社会接受。既然如此，还不如“不言”。但更认定自己的主张所具有的合理性，认为自己的主张符合社会的需求，合乎人类的需要。自己虽然不言语，但无妨于自己主张的真理性。就像上天不言，天下照常四时运行、万物生长。

对于孔子的思想，孔子的弟子理解程度并不一样。例如，孔子师徒困于陈蔡时，孔子依然“讲诵弦歌不衰”，直率的子路却流露出一不满的神色，他甚至对孔子的主张表示怀疑。《史